

孫邦正編著

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

六十年來國教育

國立編譯館出版
正中書局印行

究必印翻



有所權版

版初臺月十年十六國民華中

念紀年十六國建國民華中

育教國中的來年十六

角一元五精 價定本基 冊一全
角一元四平

(費滙費運加酌埠外)

正	邦	孫	者	著	編
館	譯	編	立	國	權
潔			李	人	有
局	書	中	正	刷	行
				印	發

(號十二路陽衡市北臺灣臺)

號二十段一路昌南市北臺灣暫

司公書圖成集 銷經總外海

(號一——街老皆亞龍九港香)

店書風海

(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本日)

原(6602)號八七六〇第字業臺版內 證記登部政內

(1000)

六十年來的中國教育

第一章 緒論

教育是立國的基礎，就對外而言，我們若要維護民族的生存，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，必須靠教育來發揚民族的精神，充實國防的力量。就對內而言，我們若要建立一個民治民享的國家，也必須靠教育來訓練國民自治的能力，培養生產建設的人才。

我國古代，對於教育事業就很重視，而且以教育建設為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的基礎。例如書經舜典說：「帝曰：契，百姓不親，五品不遜，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，在寬。」其目的就在以道德教化，建立社會的秩序。三代之世，我國學校制度，已燦然大備。貴族子弟所進的學校，稱為「國學」；平民子弟所進的學校，稱為「鄉學」。「國學」有大學和小學之分，其名稱：虞曰「上庠」「下庠」，夏曰「東序」「西序」，商曰「右學」「左學」。「鄉學」在夏曰「校」，在殷曰「序」。這就是孟子盡心章所說的：「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」的意義。周代的「鄉學」制度，更可以和今日的普及教育

六十年來的中國教育

第一章 緒論

教育是立國的基礎，就對外而言，我們若要維護民族的生存，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，必須靠教育來發揚民族的精神，充實國防的力量。就對內而言，我們若要建立一個民治民享的國家，也必須靠教育來訓練國民自治的能力，培養生產建設的人才。

我國古代，對於教育事業就很重視，而且以教育建設為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的基礎。例如書經舜典說：「帝曰：契，百姓不親，五品不遜，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，在寬。」其目的就在以道德教化，建立社會的秩序。三代之世，我國學校制度，已燦然大備。貴族子弟所進的學校，稱為「國學」；平民子弟所進的學校，稱為「鄉學」。「國學」有大學和小學之分，其名稱：虞曰「上庠」「下庠」，夏曰「東序」「西序」，商曰「右學」「左學」。「鄉學」在夏曰「校」，在殷曰「序」。這就是孟子盡心章所說的：「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」的意義。周代的「鄉學」制度，更可以和今日的普及教育

制度比美：在州有序，在黨有庠，在閭有塾（按二十五家爲閭，五百家爲黨，二千五百家爲州）。漢代學校制度分「官學」「私學」二大部分。「官學」之由中央政府辦理的，有「太學」，爲大學性質；有「鴻都門學」（相當於藝術學院）、「四姓小侯學」（官邸學校），爲特殊學校性質。「官學」之由地方政府辦理的，有「郡國學」，爲大學性質；縣、道、邑設「校」，鄉設「庠」，聚設「序」，都是小學程度。「私學」有「書館」，近於小學；至於著名經師設帳傳授，生徒著錄有近萬人以上者，則近於大學。我國古代由於教育發達，所以人才輩出，中國文化也隨之發揚光大。

英國史學家威爾斯（H.G. Wells）在他所著的世界史綱（Outline of History）內說：「歐洲的史家，囿於偏見，過份美稱羅馬文明。其實，羅馬的盛世，不過二百年，若和同時代的中國漢朝相比，便縮成歷史上的一小頁。羅馬帝國已經成了歷史上的陳蹟。然而中華民族却以統一的文化，縣延數千年而至今，分了又合起來，有時被異族征服了，到後來却同化了他們的征服者。爲甚麼？因爲那愚昧的羅馬帝國，全不懂得教化人民的重要，而中華民族在漢朝已經有太學、郡國學，和選舉孝悌茂才的完備制度了。」這一段話，確是持平之論。

所可惜的，是我國學校教育，從隋唐以至清同治年間，降爲科舉的附庸。流弊所及，學校成爲科舉的預備機構，除了考試和給餼以外，幾乎沒有甚麼教育活動。學官不事教授；士子也視學校爲利祿之階，以致徒有學校之名，而無學校之實。

前清道光以後，外侮日亟，國勢危如累卵，於是朝野上下，都覺得祇有廢科舉，興學校，爲救亡圖存之方。例如張百熙等奏設學堂云：「當此時勢阽危，非人莫濟，除興學堂外，更無養才濟時之術

。』於是仿倣歐日學科，設立新式學校。所以我國新教育制度的產生，純粹是爲了救亡圖存，適應當時的需要。

國父領導革命，對於教育事業至爲重視。民元前十二年，國父創組興中會，所訂平治章程中，對於教育方針，有下列規定：

「變科學爲專門之學：如文學、科學、律學等，俱分門教授。學成之後，因材器使，毋雜毋濫。」（平治章程第六條）

民國肇建，國體更新。教育事業亦有一番新氣象。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宣言中，提出振興教育之主張：

「主張振興教育。教育爲立國之本，振興之道，不可稍緩。其今日所宜振興者：一曰法政教育，一曰工商教育，一曰中等教育，一曰小學師範教育，一曰女子教育。法政教育，所以使國民多得法政常識；工商教育，所以輸進工商新知識，發達工商；中學教育，爲小學之模範，大學之基礎；小學師範教育，所以普及教育之第一步，而養成師範人才；女子教育，所以增進女子知識，發達女權。此數者，爲本黨振興教育之計劃，而本黨對於政策所主張者八。」

國父在歷次講演中，亦一再申述振興教育之重要。例如民國元年對廣東女子師範第二校講「女子教育之重要」：

「今民國既已完成，國民之希望正大，然最要者爲人格。我中國人民，受專制者已數千年；近二百六十餘年，又受異族專制，喪失人格久矣。今日欲回復其人格，第一件事，須從教育始。」

「講中國人數四萬萬，此四萬萬之人皆應受教育。然欲四萬萬人皆得受教育，必倚重師範，此師範學校所以應急辦者也。」

開國之初，軍閥割據局面猶存，連年戰亂，以致教育事業無法發展。

民國十五年，總統領導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，完成國家的統一。民國十六年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積極展開國家建設工作。總統根據數十年革命工作之經驗，深知教育為革命建國之基礎，對於教育事業至為重視。總統說：

「我覺得無論那一個國家或民族，要想革命成功，臻於文明興盛之域，第一件要緊的事情，就是改造教育。更明白的說，就是一個國家的強弱或一個民族的優劣，並不在乎軍備之良窳或武力之大小，而完全在乎文化的開塞，教育的高低。因為文化和教育是一個國家和民族一切活力的源泉，而軍備和武力不過是一時的物質的力量。前者是生長的，無限的；後者是機械的，有限的。所以教育力量比甚麼武器的力量都大。」（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三日在江西省教育討論會講：教育救國與救國教育）

總統又說：

「我們建國的基本要務，就是教育。教育乃國家民族精神與文化亦即永久的生命之所託。所以教育之優劣成敗，即國家民族興亡盛衰最大的關鍵。」（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在高級人員會議講：建國的行政）

總統對於教育界人士的期望，尤為殷切。總統說：

「要救國就要先改造社會風氣。要改造社會風氣，就要先改造我們的社會心理和習慣。要改造社

會心理和習慣，就要先從我們教育界起首。教育界是社會的領導者，就是社會的教師。所以我們要改造社會，非從教育界做起不可。如果不注重教育，而在旁的地方枝節去做，那決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功效。」（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在漢口怡和邨對教育界講：救國教育的要點）

由於 總統積極倡導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，即致力發展全國教育事業。因此，從民國十八年至民國二十五年期。全國各地教育事業，呈現一片蓬勃氣象。各級學校之數量及學生人數，均有增加。而最重要的措施，厥為民國十八年四月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，為中華民國教育事業確定方向，並使教育方針與建國理想密切配合。民國十八年三月，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「確定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案」內，指明此項措施之重要性：

「教育為立國之大本，國民精神生活與實際生活，能否臻於健全暢遂，全視教育方針，能否適應民族與時代之需要。而國民革命之基礎，若不充實之以教育的建設，則三民主義亦將無徹底實現之期

」過去本黨因注全力於障礙之掃除，對於教育未暇為整個方針之樹立。今當全國統一，訓政開始，本黨在政治上之地位與責任，更不同於往昔。三民主義的國家建設、社會建設、與物質建設，全國人民方延踵以企本黨之啓導。而過去自清末以來，無方針無目的之教育所遺留之惡影響，積數十年之造因，正於此時乘民族衰頹民生凋敝之會，併合而為總發露。本黨於此若不明定教育之方針，確立實施之原則，作全國更始之基，而洗放廢因循之弊，則不惟訓政時期之一切救國建國之計劃，感蛙步而難行，即國家民族今後之生機，亦必陷於困危而不可救，此全國迫切之要求，亦本黨不容旁貸之責任

也。

「中華民國今後之教育，應爲三民主義之教育，已無疑義。惟真正的三民主義之教育，非僅標三民主義之名所能收功，亦非僅令各級學校、誦習三民主義之文字即爲畢事，必須使一切教育上之設施，全部皆貫以三民主義之精神，無處不具備三民主義之功用，而後方可達民族獨立、民權普遍、民生發展之目的。」

「過去教育之弊害，一爲學校教育與人民之實際生活分離，教育之設計，不爲大多數不能升學之青年著想，徒提高生活之慾望，而無實際能力之培養以應之，結果使受教育之國民，增加個人之苦痛，以釀社會之不安。二爲教育之功用，不能養成身心健全之份子，使在國家社會之集合體中，發揮健全份子之功用，以扶植社會之生存。三爲各級教育偏注於高玄之理論，未能以實用科學，促生產之發展，以裕國民之生計。四爲教育制度與設施，缺乏中心主義，祇模襲流行之學說，隨人流轉，不知教育之真義，應爲縣延民族之生命。四弊相逐，使共黨虛偽偏激之教義，得以乘間侵入，貽重大危害於我國，而幾乎搖動國民革命之根本。」

「過去教育病因之總因，既由於違反三民主義之精神，則今後徹底更始之謀，自非明定三民主義爲教育之宗旨，並就最急需之點，確立實施之方針不爲功。」

在本案內，提出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，其教育宗旨條文如下：

「中華民國之教育，根據三民主義，以充實人民生活，扶植社會生存，發展國民生計，延續民族生命爲目的。務期民族獨立、民權普遍、民生發展，以促進世界大同。」

民國十八年四月，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，爲全國教育設施的準繩，於是意見紛歧的教育思想，纔算有了一個歸趨。

從民國十八年到民國二十五年，可說是中華民國教育的黃金時代，全國各級教育的數量，均有顯著的增加。民國十八年，全國小學校計一二、三八五所，學生八、八八二、〇七七人。到了民國二十五年，小學校數增至三二〇、〇八〇所，學生增至一八、三六四、九五六人。民國十八年度，全國中等學校計二、一一一所，學生三四一、〇二二人。到了民國二十五年度，學校數增加至三、二六四所，學生數增至六二七、二四六人。民國十八年度，全國專科以上學校計七十六所，學生二九、一二人。到了二十五年度，學校增加至一〇八所，學生數增至四一、九二二人。由上述統計數字，可知當時教育發達的情形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軍興，遍地兵燹，戰區學校，大多毀於敵人砲火。惟後方各省，仍然絃歌不輟，戰區青年多轉移至後方就學。政府一面增設學校，安置戰區內移之青年，一面設置貸金，以維戰區青年之生活。當時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獲得此項貸金者，每年在五萬至七萬米左右。中等學校學生獲得此項貸金之人數，大致相似。

在教育制度方面，爲適應當時的需要，也有若干創舉。例如在初等教育方面，民國二十九年三月，國民政府公布國民教育實施綱領，創設新的國民教育制度，奠定普及教育之基礎，並使義務教育與失學民衆補習教育合併辦理，易於推行。從民國二十九年度起，推行第一次義務教育五年計劃。至民國三十三年度止，五年之內，後方入學兒童之人數，等於戰前全國小學學生之人數，足見成效之速。

在中等教育方面，政府除了維持原有各地中學外，另設國立中學四十八校，招收戰區遷往後方之青年，同時辦理員生救濟工作，以安定其生活。並積極發展職業及師範學校，培養技術人才及小學師資。在抗戰開始時，全國有中等學校三千二百餘校，學生六十二萬七千餘人。迨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日本投降，陷區收復，全國有中等學校四千五百餘校，學生一百三十九萬四千餘人。

在高等教育方面，戰區大學多遷至後方，如國立中央大學（遷至四川重慶）、國立政治大學（重慶）、國立交通大學（重慶）、國立濟南大學（昆明）、國立復旦大學（重慶）、國立浙江大學（貴州遵義）、國立武漢大學（四川嘉定）、國立東北大學（四川三台）、私立金陵大學（四川成都）、私立東吳大學法學院（重慶）、私立大夏大學（貴陽）、私立武昌華中大學（雲南大理）。國立北平大學、國立北平師範學院、國立北洋工學院、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則於陝西漢中合組國立西北聯合大學，國立北京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南開大學，則遷至雲南昆明，合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，由是八年抗戰之中，國家培育人才之工作，未嘗中輟。此外，建立大學教員資格審查制度，獎勵學術研究，對於提高大學師資水準，貢獻甚大；創設師範學院制度，以培育中等學校師資，尤具成績。在數量方面，抗戰時期，高等教育發展亦快。抗戰以前，全國專科以上學校，僅有一〇八所，學生四萬餘人。民國三十四年度第一學期統計，全國專科以上學校，有一百四十校，學生八萬三千餘人，學生人數為戰前之二倍。

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日本投降，抗戰勝利，政府積極進行教育復員工作。惟共匪利用戰後國民生活困乏之機會，擴大叛亂，一面在各地採取軍事行動，奪取政權，一面在各學校煽動學潮，製造混亂，

以困擾政府。若干青年學子爲共匪宣傳所欺騙；甚至爲共匪所利用，反抗政府。終至大陸變色，淪於共匪魔掌之中。

政府遷臺以後，勵精圖治，生聚教訓，以「建設臺灣，反攻大陸」爲最高國策，積極振興教育，培育人才，以期達成復國建國的任務。總統對於教育改造問題，尤爲重視，在歷次講演中，沉痛檢討過去教育失敗之原因，以及今後教育改造之方針。謹擇其要點，綜述於後：

(一)過去教育失敗原因之檢討

總統說：「我覺得我們在反攻大陸時期，最重要而又最值得研究的，是教育問題。大家只要回想一下，我們這次大陸失敗何以會悲慘至此呢？我們失敗的主因，究竟是在甚麼地方？我在這兩年來失敗之後，檢討所得的結果，認爲我們最大的失敗，就是在教育與文化。……在近四十年自民國成立以來，如果我們對國民道德教育的培養，能夠有所成就，則我們今日一般國民的民族精神和國家觀念，何至於這樣喪失？再退一步說，暫不談國民道德教育，只談我們在智育上，像生產教育、職業教育與技術教育等，如果都有整個計劃，都能齊頭並進，那我們也就不至使國家長陷於此一貧弱之境，以至於今日的敗亡至此。最可痛心的，就是二十年來學校教育，如果一般校長教職員真能負責盡職，訓導得法，管教有方，那大陸青年就決不如今天那樣容易爲共匪所麻醉、利用，來反對其自己的祖國，毀滅他自己的家庭。……大家都知道，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，所以教育的成敗得失，就是國家存亡，民族榮辱的根本所在。只因爲我們多年來教育的失敗，所以就造成了此次全面失敗的主因。」（見民國四十年九月三日講：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。）

過去教育失敗的原因究竟在那裏？總統曾就此一問題加以明白的指示：

(1) 過去教育失敗的原因，在於忽視國家觀念、民族思想、道德教育。總統說：「現在大陸匪區裏的大中小學校，甚至於幼稚園的學生，都正在受共匪獸性教育。這種教育，正鼓舞着他們的野蠻和狂妄，造成子弑其父，弟殺其兄、女訟其母、夫婦互相監視，家人視同仇寇的那種禽獸不如的悲劇。共匪爲甚麼他能弄到其家人父子兄弟夫婦的骨肉之親，手足之情，竟肯背天害理，倒行逆施，悍然不顧地照着他的教育去做呢？這固然由於共匪用恐怖和殘忍的手段，來壓迫學生，麻醉青年，控制他們，不怕不就範；但是我們從前的教育，假使能夠對於國家觀念，民族思想和傳統道德精神——即對總理所訓示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，和新生活運動所提倡的禮義廉耻的四維，在教育上能夠注重、有所成就的話，那共匪決不能在這樣一二年乃至一二月之間，就能夠很快的完全把我們固有的民族倫理，傳統道德一手湮滅，而變成今日在大陸上這樣禽獸不若的慘無人道的鬼域世界！若是大陸人民果有明禮知義、明廉知耻的教育基礎，還知道一點民族大義、國家責任、和他父母子女兄弟夫婦間孝悌忠信的天性至愛，那也決不至於受匪這樣容易煽惑與盲從，被匪導演成這種滅絕人倫的悲劇了！這固然是共匪對國家民族的滔天罪惡；然而我們二十餘年來，一般有教育責任的同志，未能在教育方面遵循我們總理八德的訓示，以及新生活四維的信條，和實行本黨歷次教育方針的決議案，所造成今日這樣的人倫的大變和民族的浩劫，這是我們在革命失敗中痛定思痛、不能不懺悔的！尤其回想過去大陸上一般自稱爲博學之士，對於我民族傳統精神的禮義廉耻和孝悌忠信的國民基本教育，在學校內一般教師不僅是不肯教，而且是不敢提。反以八德爲封建遺物，而視四維爲頑固與反動教育，並以此自鳴識時，而以超然中立爲高蹈，騎牆觀望爲自由。他想不到共匪即乘這個弱點，就施其中傷離間的

伎倆，無形中已成了他的工具，受其利用而不自覺。這樣一來，以致教不成教，學不成學，師不成師，弟子不成弟子。所謂『學風校規』，掃地殆盡；『師道人格』，蕩然無存。最後卒遭今日國破家亡，清算鬥爭，而無以自拔。」（民國四十年九月三日講：「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」。）

(2) 過去教育缺乏革命精神：總統說：「歷史上清楚的說明，國家需要革命的青年，青年需要革命的教育。沒有革命的青年，國家就沒有充沛的生機和進步的動力；但是國家如不給青年以正確的革命教育，青年亦必迷失革命的方向，減少進步的力量，甚至要為時代的逆流所湮沒，造成國家失去了青年，青年也失去國家的悲局。今天我要趁此機會，沉痛的告訴大家，我們大陸千百萬青年陷入如此黑暗的地獄，五千年的文化和歷史遭受如此空前絕後的浩劫，最大的原因，就是我們過去的教育，沒有注意民族精神和戰鬥生活的基礎。我們喪失了民族精神，就無法抵抗共產集團思想的滲透；我們脫離了戰鬥的要求，因此，就無力阻擋共產國際的暴力侵略，馴至河山變色，大陸沉淪。」（民國四十年九月十一日講：「國家需要革命青年，青年需要革命教育」。）

(3) 過去教育偏重升學主義、形式主義、孤立主義：總統說：「我以為過去學校教育的根本缺點有三個：

「第一，是升學主義。這是小學和中學教育的根本缺點。小學的課程是爲了升入中學作準備；中學課程是爲了升入大學作準備。中小學課程沒有幫助中小學生教他們在家庭中怎樣做子弟。更沒有教那些不能升入中學和大學的中小學生到社會去怎樣求生活。只因大學入學考試，重視某幾樣科目，所以從小學到中學都是把這幾樣科目做目標來努力教授和學習。……

「第二，是形式主義。中小學的缺點是升學主義，升不了學的學生們怎樣，姑且不說；升了大學以後又怎樣呢？大學也有缺點，就是形式主義。在印刷術沒有發明之前，做學問要找『師承』，是爲了傳抄書本，也爲了傳授『家學』。到了印刷術發明而成本甚高的時期，普通的圖書固然可以在市場上流行，但是一個學者要成博學，還是要進都市，尤其是希望進京城，入翰林院，去讀『祕籍』，今天印刷術既普遍，書價又低廉，無論什麼圖書，只要多數人要讀，便可以大量印行。一切有助於國民進修的學問，沒有不能印成圖書，流傳社會的。一個勤學的青年，並不一定要進大學，纔能讀書。自修的青年人比之大學生，並沒有什麼差次。所以今日的大學，不應該只是講讀一些圖書，賦予畢業生一種資格，具備一種形式，作爲一種裝飾，就算了事。大學一定要指導和幫助學生適應這變動的社會，不僅有求生的能力，並且成爲建設新社會的骨幹，纔有其崇高的價值，適應國家和社會的需要。」

「第三，是孤立主義。就科學教育來說，一個人對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，要自修是很難有多大的成就的，這並不是說科學不能自修，這是由於我們沒有充分的設備，如科學館之類，可供未入學校的人自修之用。所以要學科學，就非進學校不可。但是我們還要指出今日學校裏的科學教育仍有其缺點。這就是大學教室裏的科學課本和講述，是脫離實際社會生活而孤立的。大學的科學教育既與社會生活沒有什麼密切關係，中小學的科學教育又不過是準備升入大學，那就更與社會生活沒有什麼密切關係了。一個人從小學到中學，再升大學花了十六年的光陰，究竟對於他在家中做子弟，到工廠做職工，對國家做公民，在社會上適於生存，或更進一步從舊社會的瓦解中建設新社會的事業，有什麼實際的幫助？我們的教育家也許說，這些問題和科學沒有關係的，但是教育家却要知道，我們中國人學科學，

是要把中國從農業社會進爲工業社會。在這一過程中，中國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發生了強烈的變動，也就引起了許多嚴重的民生問題，要我們來解決。科學教育怎能自處於象牙塔裏，孤芳自賞？即令我們不管那些學生能否從科學教育上得到什麼幫助，讓他們在家庭、處社會，都能比沒有學過科學的人做得好，我們也得要求科學教育對於學生進工廠、下農場，能夠增加他工作能力，叫他們勝過那些沒有住過學校的工人和農人吧！所以我們不能否認科學教育從社會生活孤立起來，是今日學校教育的一個缺點了。」（見「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」）

（4）過去教育失敗由於未能實現三民主義教育方針：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頒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，這一次總算把教育方針和建國理想結合起來。然而由於當時教育界人士不了解三民主義教育的主張，不信仰三民主義教育的理想，不切實執行三民主義教育的政策，以致教育事業對於建國工作的貢獻不多。誠如 總統所說：「我們自民國十七年四月第一次教育會議，決議了推行三民主義教育案以後，到今天已過十年。就是十八年中華民國教育宗旨的頒布，距今也已十年。但是在抗戰以前，我們全國民衆和一般青年，實際上並沒有普遍受著三民主義的教化；就是在抗戰之前，也還不能真誠一致的信奉三民主義，這固然是國家的不幸，實在也是我們教育行政方面，以及教育界共同的耻辱。」（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講：「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」）由於教育界人士未能貫徹三民主義教育的方針，以致共產主義得以乘虛而入，造成大陸上空前的悲劇。 總統說：「我們國家的教育，從來就未能實現本黨的教育政策；更沒有樹立我們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。時至今日，受了這樣國破家亡的悲慘教訓，我們如果還不能徹底反省認識此次最大失敗的主因是教育，而仍以爲教育與此次敗亡

無關，那真是太可悲可痛了。」（民國四十九年九月三日講：「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」）

（二）今後教育改造的必要

大陸失敗的主因，既在於教育，今後救國之道，亦當從教育著手。

總統說：「我以爲今後救國之道，莫急於教育。所以教育界對於今後救國責任之重大與地位之重要，實無以復加。我們如果要盡到教育的責任，而無負於民族與後世子孫的話，那我以爲只是教書講課，還是不夠，必須要將過去在大陸上教育的各種惡風敗俗徹底改革爲己任：第一，就要恢復師道；第二，就要樹立師表。因爲教育的功效，最重要的在於變化氣質，裁成人格，所以任教的先生，更須以民族大義和國家正氣，來鼓舞教育，務使每一學生青年，都能以愛國自愛，救國自救爲志節，完成其反共抗俄、復國建國的使命。」（「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」）

總統又說：「今後要反共抗俄、復國建國，必須使人民對反共復國的使命，人人有自動的效死樂死的決心，方能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第三任務。」（民國四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對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十三期研究員講詞）「說到我們今後的教育訓練，那再也不能同過去那樣放任散漫，盲從冥行地進行那種亡國式的教育和亡國式的訓練了。……我希望主管教育的同志，能夠以我從前和現在所講有關教育訓練的話，和本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、及歷次全體中央委員會議有關教育訓練的決議案，徹底檢討，來決定今後教育的方針；同時對於將來回到大陸上擔任教育的人員，也要切實考察，看他是不是能照著我們反共抗俄、雪耻復國的方針去實施。要不然，就不必讓他再回大陸去推行過去那樣亡國式的教育了。也許說得過分一點：我們今天在大陸上的民族倫理、社會基礎，並不是完全被共匪摧毀的。我們從前的一般教育界人士，至少也要分擔一部分忽略我們固有的倫理、和鄙棄我們傳統的道德的責任